

西方為什麼低估了新冠病毒？一個後殖民視角的觀察

Marius Meinhof, "Othering the Virus," Discover Society, 術士 Gandalf 譯, 理論大缸 20200413

按語：新冠病毒的肆虐此刻為世界各國帶來了巨大的挑戰，然而它所擺在我們面前的似乎並不僅僅是一個公共衛生問題。為什麼西方各國沒有更早地採取行動？為什麼西方沒有更廣泛地借鑒中國的防疫經驗？“中國病毒”的背後是怎樣的一番話語？或許從後殖民的視角我們可以為這些問題找到一些答案。

今天的這篇文章是由德國 Bielefeld 大學的社會學家 Marius Meinhof 於 3 月 21 日發表在 Discover Society 上的，原標題為 Othering the Virus (他者化病毒)。在作者和平臺的授權下術士對全文進行了翻譯。由於一些原因，翻譯的部分內容在這裏我將予以省略（以【略】表示此處有所刪減），因此這裏呈現的恐怕並不是作者完整的觀點。我希望有條件的朋友可以點擊在文末的翻譯全文鏈接來查看翻譯的完整版。此外，作者在原文中為引用的信息提供了充分的信源，因此我更是推薦有英語閱讀能力的讀者直接跳到文末閱讀原文。

正文

歐洲似乎已被 Covid-19 的大流行所撼動。德國雖然境內沒有疫情爆發的中心，卻已經封閉了國境。意大利則孤立無援，畢竟沒有國家有多餘的醫療物資。(相反,) 諸多國家正攔截著彼此的醫療物資輸送。歐盟委員會主席 Ursula Von der Leyen 表示，歐盟可能低估了新冠病毒。

然而，在目睹了新冠病毒對中國的衝擊後，歐洲人為什麼還是會低估它？為什麼中國的經驗對他們來說不甚重要？為什麼在剛剛出現不明感染途徑的病例的時候他們沒有即刻果斷地採取行動？

我相信答案的一部分在於公共話語如何將病毒置於“自由主義／專制主義”(liberal/authoritarian)或“現代的／落後的”(modern/backward)的框架下。即使有一些“中國專家”表現出恐懼，但“我們”並沒有看到巨大的威脅，因為“我們”將這病毒看作屬於某個獨立於西方的、與中國專制或落後性相關的他者(other)。這一「他者化」(othering)妨礙了歐洲進行負責任的準備【略】。

這篇文章基於集中但非系統性地對澳大利亞、英國、美國、德國和中國的報紙、Twitter、微博和微信文章的閱讀。因為它並非基於系統性的抽樣和分析，所以這些是初步的印象而非深入的研究結果。

1 中國話語中的 Covid19

【這一部分的内容大家可能比較熟悉，在這裏姑且略去，感興趣的朋友們請查看文末的翻譯全文鏈接】

2 西方的回應

在西方，病毒直到很晚才被視作為危機。從 1 月末開始，從中國傳來的可怕消息就已經可見：高死亡率，由疾病帶來的永久損傷，人們在家裏或在超負荷運轉的醫院前的街道上死去，整個家庭喪失生命。然而 2 月過了一大半，西方的看客們並沒有感受到採取行動的迫切性。

支撐這一現象的是 3 種類型的態度：

第一種是恐華種族主義（**sinophobic racism**）。種族主義者們宣稱，中國人因為文化特點，比如食用蝙蝠湯，對疫情爆發負有責任，因為他們將疫情傳播到了西方。

第二種態度則建構了一種“新東方主義”，將中國描繪成專制主義的、必須最終民主化或是解體的“他者”。【略】也就是說，東方主義話語們（1）通過自由主義／專制主義的框架來看待事件。（2）將疫情爆發看作是非自由主義制度終將失敗的證據。（3）將病毒劃入專制主義的他者的領域。（4）通過使所有來自中國的表述變得可疑，來使中國人失聲：官方的中國病例數、死亡率、關於成功的封鎖策略的報告等等。由於總會有人懷疑專制政權的操縱，這使得根據這些信息作出行動變得困難。

在很多情況下，新東方主義模糊了政治批評和種族主義的界限。比如，德國報紙 *Spiegel* 將病毒稱為“中國製造”。對外政策將封鎖病毒與封鎖中國畫上等號。華爾街日報將中國叫做“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這一稱呼再次啟用了一個在 1895 年後被用於合理化對中國領土入侵的詞彙，包括日軍的侵略與屠殺。

第三種類型的反應遵循了一種我稱為“殖民主義時間觀”(colonial temporality) 的模式。在這裏，與其說將中國視作“他者”是由於自由主義／專制主義的區分，不如說是由於現代／落後的區分。

比如，德國國家媒體並沒有將中國共產黨刻畫為一個邪惡或者失敗的政權。它們將病毒嚴格地以一種自然現象來對待，請來病毒學家，而非社會科學家，去試圖理解它。然而這並沒有讓德國人產生對病毒的充分的戒備，即使到了 3 月，德國專家們依然堅稱被讚譽為“世界最好的”的德國醫療系統可以基本應對疫情。與此同時，儘管有著中國在封鎖上的成功，德國專家們堅持疫情是無法封鎖的，而我們能做的僅僅是使感染率的曲線“更加平緩”。大眾媒體和網民們似乎主要關心的是安撫大眾情緒。哪怕在 3 月，許多表示擔憂的帖子還會以“我知道新冠病毒並不需要擔心，然而...”來開頭。直到 3 月 12 日，我還能找到人們在論壇上討論這一疾病對於健康人如何是無害的（我沒有提供信源以保護他們免於網絡暴力）。

來自中國的關於致命病毒的報導並沒有被認為是與德國相關的。它們沒有如同在新東方主義的話語中那樣被構建為謊言，但是它們也沒有被看作是值得被德國關注的。在這背後並非是敵對的邏輯，而是一種想法，認為一個在發

展中國家致命的疫情，不會傷害像德國一樣的現代國家。而這同樣包含了一絲他者化的元素，令「COVID 19 可以在短期內威脅到歐洲」的看法顯得難以置信。

3 殖民主義的反擊

對病毒的他者化至少帶來 4 個頗有爭議的效果：首先，這一框架將中國人、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綁定在一起，因而令一些粗魯的種族主義得以掩蓋成為政治批評。【略】第二，它轉移了歐洲和美國對抗病毒的準備的充分程度的問題。第三，它為「中國對抗疫情的成功策略在民主國家並不適用」的論斷提供了依據。第四，執著於自由主義 vs. 專制主義疾病控制，使許多人忽視了向韓國學習的可能，而韓國在控制 Covid 19 上的表現非常優秀。

因此，在歐洲失敗的，並不是自由主義民主，而是後殖民主義傲慢。對於瞭解在中國發生的事情（歐洲）並不缺乏信息、語言能力或時間。缺少的，是由於盛行的東方主義思想和殖民主義時間觀，而沒有將中國的災難與“我們”（歐洲）聯繫在一起。【略】

4 後記（發表於 4 月 2 日）

由於這篇文章發表於 3 月 21 日，一些國家在被病毒衝擊後重新考量了它們的政策。然而，在許多方面，新東方主義的敘事依然十分明顯，最直接的是將中國應對 Covid-19 的方法簡化成專制主義元素，也就是：封鎖與全面居家隔離。一些知識分子已發聲對這一“中國式解決方法”表示反對。然而其他人則贊許對這一“解決方法”的表達方式並推動他們自己的政府採取同樣的措施。一個中文表達有著同樣的邏輯，它可以被粗略地翻譯為“with isolation, there are no human rights, without it, there are no humans left”（隔離，人權沒了；不隔離，人全沒了）

但是，把“中國式解決方法”簡化為封鎖在兩個層面是很危險的：首先，它再次消除了從中國學習的可能，因為在封鎖的基礎之上，大面積檢測和對醫務工作者的強有力的保護，同樣對於控制疫情是必要的。其次，一種反向的新東方主義現在似乎在讓人們希望他們的政府實施專制主義式的封鎖，因為他們相信中國已經“證明”它是有效的。而這同樣是危險的，因為它使人們相信單純封鎖而沒有其它措施，就可以解決問題。

但這次不同的是，許多著名的報紙發聲反對將中國的解決辦法簡化為封鎖。然而舊的這樣（簡化）的敘事依然構成了一個危險的遺產迫切地需要被挑戰。

這裏感謝原作者 Marius Meinhof 和 Discover Society 提供的支持！